

韦政通 编

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韦政通 编

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 / 韦政通编.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208 - 08444 - 5

I. 中… II. 韦… III. 思想史-中国-文集 IV. B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9035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台湾水牛出版社授权
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责任编辑 何晓涛

装帧设计 王小阳



世纪文景

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

韦政通 编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9

插页 2

字数 214,000

版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444-5 / B · 715

定价 30.00 元

目 次

中国思想史方法论的检讨(代序) 韦政通 / 1

通 论 篇

《中国古代哲学史》导言 胡 适 / 29

道术(哲学)史的做法 梁启超 / 51

《中国哲学史》绪论 冯友兰 / 58

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计划 罗根泽 / 74

略论作中国哲学史应持之态度及其分期 唐君毅 / 83

中国哲学研究之一新方向 唐君毅 / 94

论哲学史 吴 康 / 108

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与态度问题 徐复观 / 116

治古代思想史方法

——答辅仁大学历史学会问 徐复观 / 127

论中国哲学史之方法 劳思光 / 135

我对中国思想史的几点认识 韦政通 / 154

研究中国史学与哲学的方法与态度 刘述先 / 169

《历史与思想》自序 余英时 / 179

试论思想史的历史研究 李弘祺 / 189

近代中国思想研究及其问题之发掘 王尔敏 / 223

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 [美]史华慈著 张永堂译 / 242

专 论 篇

论性命说之语学及史学的研究 傅斯年 / 261

中国政治思想史之起点与分期 萧公权 / 265

《原性篇》论述之方式、态度与方法 唐君毅 / 279

中国思想史工作中的考据问题 徐复观 / 286

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建构问题 傅伟勋 / 290

中国思想史方法论的检讨(代序)

韦政通

黄俊杰博士在《思想史方法论的两个侧面》一文的结尾说：“如何就吾国学问之传统以转成一谛当可行之思想史方法论？此实为吾人今日所面临之问题，亦为吾人所应努力以赴之挑战。”^[1]当我们朝这个目标努力的时候，把前人这方面的经验与见解加以整理并做一番检讨，实是一必要的步骤。

根据我搜集和阅读所及的 20 篇文章，给我的印象是：

(一) 在过去的 60 年中，国内从事思想史或哲学史的工作者，涉及方法论的文字，一半是属于有关著作的序言和绪论。这些文字涉及的问题很广，其中有一部分是个人工作的经验，个别的经验虽不足以形成系统化的方法论理论，但方法论理论的建立，却不能不重视这些经验。

(二) 从事思想史或哲学史工作的前辈，很少注意同时代的西方有关方法论理论的进展，他们对于方法论的见解，有的来自独立的思考，有的来自工作经验以及对这些经验的反省。晚近从事思想史工作的学者，不但注意当代西方的方法论，且有扼要的评介，受西方方法论影响的论著也已不断出现，这说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已

[1] 此文原载《台大历史学报》第 4 期，现收入《史学方法论文选集》，1979 年，华世出版社。

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虽然新观念的引入，它在中国思想史上应用的成效如何，犹待时间的考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新观念的介入和方法论意识的提高，必然可以为中国思想史带来新的精神与面貌，并加速中国思想的现代化。

（三）前辈学人大多有单打独斗的气概，成一家之言的抱负，但研究精神不足，封闭、独断兼而有之，对同时代学人的工作经验与研究成果，很少有同情的了解，因此门户之见较深，同于己者则互相标榜，异于己者，往往不免意气之争。在这种学风下，很难讲究谨严的治学方法，也不足以学术树立典范。年青一代的学者，这方面已有显著的改进，他们已感受到学术工作正面临世界性的酷烈竞争，多知力争上游，不论传统和现代，也不论新旧和中西，已逐渐培养出一种稳健持平的态度，做审慎的抉择与评价，假以时日，必能为中国的学术研究开辟新境，为中国的学术独立奠定坚实的基础。

下文共分五节：（1）思想史的目的与理想；（2）治思想史的方法与态度；（3）思想史中的解释问题；（4）中国思想史的分期；（5）由思想特性带来的困难。

一 思想史的目的与理想

无论是思想史的作者和读者，在他写和读这类著作时，都可能有“思想史的目的与理想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一种学问要成为一独立的科目，必须有不可取代的目的，也必须有值得永远努力以赴的理想。这目的与理想究竟是什么？当胡适在六十年前（1919年）出版第一部用现代形式撰述的《中国哲学史》（卷上）时，就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他提到哲学的内容包括：（1）天地万物怎样来的？（宇宙论）（2）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名学及知识论）（3）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4）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能思想、

行善去恶呢?(教育哲学)(5)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如何管理?(政治哲学)(6)人生究竟有何归宿?(宗教哲学)胡先生认为哲学史的工作,就是要把以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1]此外胡氏又就方法的观点指出哲学史有三个目的:(1)明变;(2)求因;(3)评判。^[2]胡先生的这些见解,在今天已没有必要做深细的检讨,更没有必要做任何讥刺性的批评,须知一件工作的肇始是很困难的。为了和以后的发展有个比较,我只指出两点:第一,当胡先生写这部开创性的著作时,显然还没有哲学史和思想史区别的概念,就该书的内容看,只能算做思想史。第二,他所说的哲学史的工作或目的是一般性的,还没有注意到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特殊性。

1930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出版(下册是1934年)，“绪论”一开头就说：“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所谓西洋哲学，包涵三大部：(1)宇宙论——目的在求一“对于世界之道理”。(2)人生论——目的在求一“对于人生之道理”。(3)知识论——目的在求一“对于知识之道理”。^[3]以西洋哲学为准来看中国哲学，从类目上中国哲学虽然也包括这三个部分，但由其内容，尤其是思考方式看，至多只能发现中国哲学的粗陋部分。站在西洋哲学的立场，以为中国根本没有哲学，至今仍是西方汉学界一个很流行的看法，冯氏以这样的观点写中国哲学史，如何能了解中国哲学的特征与精华？事实上冯先生并没有完全照他的观点去写，他讲到经学，甚至以为由汉至清都属于经学时代，试问经学属于西洋哲学的哪一部门？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潮流，使中国人在思想上丧失了自

[1] 胡适：《中国哲学大纲》（卷上），页2，民国八年，上海商务。

[2] 胡适：《中国哲学大纲》（卷上），页3—4。

[3]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页3。

主，冯氏处理中国哲学史的观点，乃一典型的例子。冯书比胡晚出11年，对哲学史和思想史之间仍缺少清晰的概念。

冯书出版后将近半个世纪，劳思光出版了《中国哲学史》第一卷(1968年)，这是第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论著，书首有《论中国哲学史之方法》(代序)，讲到哲学史的任务，必须满足三个条件：(1)事实纪述的真实性；(2)理论阐述的系统性；(3)全面判断的统一性。^1(2)二个要求原则上没有问题，但这二种能力直接从中国传统的典籍中并不容易学到，所以要真正做到并不是件简单的事，而这主要涉及思想史的“解释”问题，下文将有专节讨论。关于第三个条件，劳氏的解释是：“就第三点说，哲学史要统观人类心灵之发展，智慧之成长，所以必须有一贯的判断原则，一定的理论设准，以使所下的判断表现一定的识见，一定的尺度。”^[2]相应于哲学史而言，这个条件的提出，是一合理的观念。劳氏对西方哲学有相当的了解，他这个观念可能得之于钻研西方哲学传统的经验，在西方哲学传统里，显然可以找到一定的理论设准和一贯的判断原则，否则怀特海说柏拉图以后的哲学都不过是柏拉图思想的注脚就难以理解了。要把这个观念应用到中国哲学的传统，就有很大的限制。中国哲学传统有儒、道、释三条主流，大抵说来，他们重视行为的实践层次远胜于理论建构，三家对人生问题见解的分歧也远大于西方哲学家在知识论和形上学上的歧异，要由各家内部发现一定的理论设准和一贯的判断原则，这是可能的，隋、唐时代佛家的判教，就很近似这样的工作。但要由儒、道之间或儒、释之间，寻找这样的原则和设准，虽非不可能，然根据它所下判断的效果如何，犹待事实的征验，不能光靠凭空设想。还有，试问这样的原则

[1] 劳思光：《中国哲学史》，第一卷，页15，1968年，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

[2] 劳思光：《中国哲学史》，第一卷，页16。

和设准又如何建立,是得之于经验的抽离或归纳,还是仅根据主观的印象所做的设定?如是经由前者,当我们真的尝试这样做的时候,很可能最后会证明所谓一贯的判断原则,一定的理论设准,不过是一个臆测罢了;如果是后者,那就很难避免由自己哲学立场而带来的偏见,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就是一显例。如果哲学史必须有这样的原则与设准,那只能如科学的假设一样,它不是得之于经验的抽离或归纳,但必须在经验的检证程序中不断地加以修正,一个有效验的判断原则和理论设准,必须经由这样的程序才能获得,而且这样的程序是无止境的。

在过去的30年,治中国思想史者,肯向原典投下惊人精力,在一定范围之内,做彻底整理工作的是徐复观,徐先生谈方法大多是长期艰辛工作中得来的经验之谈,很少凭空臆测之言,他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与态度问题》的文中,也讲到研究思想史者的任务,他说:“中国的思想家,很少是有意识地以有组织的文章结构来表达他们思想的结构,而常是把他们的中心论点,分散在许多文字单元中去……中国的思想家系出自内外生活的体验,因而具体性多于抽象性。但生活体验经过反省与提炼而将其说出时,也常会澄汰其冲突矛盾的成分,而显出一个合于逻辑的结构。……但这种结构,在中国的思想家中都是以潜伏的状态而存在。因此,把中国思想家的这种潜伏着的结构如实地显现出来,这便是今日研究思想史者的任务。”^[1]怎样才能做到这一步?徐先生提示,在仔细读完一部书后,必须加以摘抄,加以条理,加以分析,使义理前后贯通,再左右比较,“我最多的工夫,常常是花费在这一层面上”^[2],这是最笨的工夫,却是最踏实而有效的工夫,看来很平常,做起来却

[1] 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页2,1959年,台中东海大学。

[2]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三,“代序”《中国思想史工作中的考据问题》,页4,1979年,台湾学生书局。

烦琐而辛苦。这种方法和其他方法一样，甲用之有效者，并不能保证乙用之能有同样效果，因这牵涉到个人的才具，还关联到个人思想的基本立场、态度与训练，而这些多半不是方法所能为力的。

刘述先在《研究中国史学与哲学的方法与态度》一文中^[1]，强调“还出本来面目，这是哲学史家所要实现的第一责任，也是今日研究中国哲学史所要追求的终极理想”^[2]。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有深刻的同情的了解。同情的了解要靠相应的才具，“狄尔泰说，只有一个诗人的心灵才能了解诗。同样，只有一个哲学的心灵才能够了解哲学观念的意义。”^[3]有了这样的才具，才能“探讨哲学思想的真象、来龙去脉以及它对人生的实存关系，并批评地探讨该思想本身逻辑融通一致与智慧上的成果”^[4]。这也就是刘先生所说的“内在的探讨”。对佛学与理学，内在的探讨还要包括“内在的体验”，“如果缺乏体验，根本就看不出这些东西的意义。”^[5]胡、冯二氏的中国哲学史，最严重的一个缺点，就是缺乏这种体验。既能具备传统思想家那样的体验，又能具备西方式的系统化的能力，然后去“显发古人思想中所潜在之逻辑性，使其具备与内容相适应之理论结构”^[6]，乃今后治中国思想史者努力的一大目标。

西方现代的思想史方法论有很大的进展，其中历史法研究，就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种。这种研究法不但要了解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如何形成，并进而研究他如何用他的思想去认识他生存的时代与环

[1] 此文原载1968年1月16日—18日《“中央”日报》副刊，现收入《史学方法论文选集》。

[2] 见《史学方法论文选集》，页243。

[3] 见《史学方法论文选集》，页239。

[4] 见《史学方法论文选集》，页373。

[5] 见《史学方法论文选集》，页242。

[6] 徐复观：《重印熊十力佛家名相通释序》。

境,以及如何决定他对环境所生的反应。这种研究法可以帮助我们
在历史研究中发现另一个重要的园地,因历史研究除探索政治、经
济及社会的现象之外,还应该去追究个人在参与这历史活动时心境的
运作、构想和各种决定行动的动机。^[1]这种研究法在现有的条件
与水平来看,未免悬格太高,因为它不但需要通史的充分知识,还
须行为科学的技巧,在一生中需要很长时间去做准备,而实际的研
究工作却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运用。但方法论不能不由一切的可能
性方面去设想,从事思想史工作的人,脑中可能性的预设越多,则
运用资料的效果也必越大。

在这一节的最后部分,我们不能不郑重推荐史华慈《关于中国
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一文^[2]。照个人的看法,它是我们搜集的
20 篇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篇,他的方法是针对中国思想史谈的,而
他又具备治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经验,因此特别值得我们重视。因他
察觉到“思想史”一直是人文研究中特别模糊不清的领域,所以他
企图建立“一个思想史的概念”。他从两个问题出发:(1)我们如
何界定思想史的范围与局限?(2)我们如何理解思想史与其他学科之
间的关系?对这两个问题经过精辟的讨论之后,为思想史的概念建
立了四点基本假设^[3]:

(1) 思想史的重点并不仅仅限于一般所谓的“自主过程”的
思想领域内,它主要着重在人类对他所处的生活环境的意识
反应。

(2) 思想史家的理想是希望对于自己研究的人物的思想尽
可能达到完全的了解,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想用一些假设性的起因

[1] 见李弘祺:《试论思想史的历史研究》,《史学方法论文选集》,页 370。

[2] 此文为张永堂所译,见《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1976 年,联经。

[3] 见《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页 14。

来“解释”他们的思想,相反的他还承认在这个领域中人类有相当限度的自由。他也对于一些起因假设发生兴趣,但必须对于他所研究的人物的思想背景有真正的帮助。

(3) 把人类的意识反应看做是整个人类行为的动因之一,因此对于观念与人类其他活动领域的关系也有兴趣。

(4) 当他把在研究过程中对于自己所遇到的思想是否有效的问题能完全不参与这种幻想放弃以后,他仍然企图把自己的判断,以及所了解的别人的思想划清界限。

以上第一个假设被史氏认为是思想史的中心课题。第二个假设中所谓“达到完全的了解”,是指思想史家要设法了解被研究的人物的环境,正如他们自己所了解的一样;设法了解他们的观念,正如他们自己所了解的一样。史氏也深知这对思想史家实是一种遥远的理想,“然而朝着这个遥远的理想去努力,却正是思想史家主要的存在理由”^[1]。第三个假设是对第一个假设的一个补充,而主要是在界定思想史的范围与局限。最后一点是关系到研究思想的主观性与客观性问题,其中蕴涵思想史家要避免把自己的判断当做对别人思想的了解。

二 治思想史的方法与态度

在这个问题上,每一位从事思想史的工作者,都会遭到很大的困难,因为每一种有点效验的方法,都是根据别人的经验经由苦思和探索所得,因此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依样画葫芦地拿来应用的,你如果想建立一种适合自己应用的方法,必须靠自己辛苦地摸索。所以下面简介的一些方法,都只能在极有限的范围之内有参考的价

[1] 见《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页8。

值,假如自己没有研究思想史的丰富经验,连有限的参考价值也不容易获得。

早期胡、冯二先生哲学史方法的概念是很粗略的,他们谈史料审定和整理史料的方法,这些当然不是不重要,尤其在初步摸索的阶段,不过这些工作都还只是写思想史的预备工作,胡氏的书大部分的篇幅都在做这种工作。冯氏的书虽摆脱了这个限制,但在方法上依旧没有留下什么重要的启示,倒是有一点仍有必要提出来加以检讨,此即有关冯氏对“叙述式的哲学史与选录式的哲学史”的见解,他以叙述式的哲学史,使读者不能与原来史料相接触,易为哲学史家的见解所蔽;而选录式的哲学史又使史家的见地不易有系统的表现,读者也不易获知其所见。因此,冯氏主张“兼用上述两种方式,或者可得较完善之结果”^[1]。事实上他应用的结果,不但不完善,而且为这类著作留下一个恶例,一直到今天,仍有人在同类的书中,大量征引资料,引这些资料究竟是何作用,作者自己究竟懂不懂,使读者莫名其妙。选录只是整理资料,做得好可以提供读者一些方便,但这纯是资料性的工作,不属于著作的范围,所以根本无所谓“选录式的哲学史”,如果在今日仍袭用这种方式,我们认为那不过是作者无能和偷懒的遁词罢了。

前辈学者中,值得一提的是罗根泽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计划》^[2],他详细列举了从人的研究、书的研究到学说的研究的细目,并予以简要的说明。这是一个天罗地网式的研究计划,绝不是一个人的能力所能负担的,他的构想也未必能切合实际,但在那个年代(1933年)确可以给有志于这方面工作的人,提示几个研究的方向,并可由此而知道如何下手之方。罗氏的研究计划中,特别令

[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页22。

[2] 这个计划见于罗氏编的《古史辨》第四册罗氏的序言中。

人敬佩的一点是，他在那个年代，已觉悟到要“建立中国哲学之独立的事业”^[1]，他的觉悟显然表示他对胡、冯二先生的书以及当时一般研究中国哲学的风气，有过批判式地反省，他称这种工作是“使中国哲学披上西洋的外衣”，是“中货西装的把戏”。^[2]这个中国哲学独立的要求，至今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一个目标。要做到这一点，基本上必须要重建精神上的自尊与自信，那些一味歌颂传统文化和抱着一厢情愿的文化优越感的人不足论，因为那只是长期受挫意识的反应，即是那些一生为中国文化而奋斗，并具有高度真诚的新传统主义者，也未必具备充分的自尊与自信，因为他们论及中西文化时，往往是以中国的好的去比西方的坏的，以中国文化的理想去比西方文化的现实，对西方近代文明也相当缺乏平视的眼光和理智的判断。

在当代中国哲学史家中，第一个提出他自己的方法论，并应用于写作的，是劳思光。任何一种方法，在实务中由于一些条件(如资料)的限制，很难予以充分有效的应用，但方法意识的提升，已表示作者的工作是希望能在一定的设准控制下进行，并明显地表示出作者的定见；实际的效果如何，已属次要问题。能严格地向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至少在写作态度上，在同类著作中已是一大进步。劳氏在批评了哲学史的系统研究法、发生研究法、解析研究法后，提出他处理中国哲学史的所谓“基源问题研究法”。对这个研究法的大意，在《中国哲学史》第二卷的《后记》中，有简要的说明：“任何一个理论，都是对某一个或某一组问题的解答，因此，当我们想了解一个已成的理论时，我们必须先弄清楚立论者所要面对的是什么问题。又因为建立理论的人，并不常常很清楚地说明他要解

[1] 《古史辨》第四册，页13。

[2] 《古史辨》第四册，页12。

决的问题是一、二、三等等，因此，我们就得从代表这个理论的著作(或文件)中清理出它所关涉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理论每每牵涉多层的问题，而立论者又不一定提纲列目地摆出来，因此，我们每每在努力了解一个理论的时候，发现它所关涉的问题竟有许多，于是我们须作进一步的工夫，从这些问题的‘理论关联’着眼，将它们组织起来，看看是否大部或全部问题，可以一步步地系归某一个或某几个最根本的问题。这样，我们就是在揭示这个理论的内部结构。我们所发现的最根本的问题，即是在理论意义上最能统摄其他问题的‘基源问题’了。……这样，我们从事了解已成的学说时，就常常可以通过‘理论的还原’，而找出这个学说的‘基源问题’，依此展示其理论结构，再补上旁枝论点，便可以显出一个学说的真面目了。”很显然，如果用这个方法研究一家的哲学，是可以很有效的。这不是什么新方法，凡是探讨专家哲学的人，在不同的程度上都会用到这个方法，至于效果如何，这已不是方法本身的问题。如果用这个方法去处理几千年的哲学史，它的限制也是很明显的，因为哲学史上有许多哲学家和许多不同的学派，哲学家与哲学家之间的思想可能完全对立，学派与学派之间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假设与前提，在这种情形下，如何了解他们之间经由互相刺激互相论辩，以促进思想史的发展，也是哲学史家的重要工作，这就不是基源问题研究法能完全处理得了的。劳先生在第二卷的“后记”中又说：“第二卷的写法基本上仍和第一卷相同；唯一的差异是我不曾处处明显地标出各家或各派的‘基源问题’——尽管我所用的方法并无大改变。”为什么不再处处标明了？可能是在实际的工作中，感觉到这种方法的限制，当一种方法反而使自己束手束脚，而又无法有效处理复杂问题时，自不能不有所更张了。处理哲学史或思想史这样复杂的问题，不能不讲究方法，但绝无定法，每一种适合自己运作的方法，都必须靠自己累积的经验去构想出来，但也只能是一个大抵的概

念，随处遇到不同的问题，都须要表现出史家的匠心独运，墨守任何一种方法，无异是为自己预设陷阱。

唐君毅在《中国哲学研究之一新方向》^[1]中，企图为中国哲学研究建立“一更完善的客观研究态度”。他列出顺序而进的八个步骤，一至七是辞义、义涵、义系、义旨、义趣、义用、义比之研究，最后一步是“诸哲学家在历史中相续出现，或相承、或相反、或相融、或分化之迹象，及其中所表现之哲学精神之生长转易、凝聚与开辟之道。此为真正之哲学史，或黑格尔所谓大字写之哲学——此可简名为‘义通’或‘义贯’之研究”^[2]。唐先生七大册《中国哲学原论》，大抵是采用这种方法写成。这种方法他又称之为“即哲学史以言哲学”。^[3]他主要的目的是以传统哲学为原料，重建中国的哲学，其中究竟哪些是古人的思想，哪些是作者自己的哲学见解，大部分很难分辨，虽然也具有哲学史的意义，但绝不同于一般的哲学史，它是一家言的哲学史，这种方法别人是学不来的。

治中国思想史在注重思想理论的内在探讨之余，又如何兼顾思想理论与文化其他诸领域活动的关系，是每一位从事这一工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唐君毅在40年前就说过，“述中国哲学史，则自始即难将其与其他学术文化之交互关系存而不论”，原因是“中国哲人的立言，罕有如西方哲人之一以纯粹真理为鹄的者，恒系为应付当时之社会文化之问题，补偏救弊，为求善而求真”。^[4]事实上的确是如此，在今日的问题是，这种交互关系仍待我们去发现，我们又究竟能以怎样的问题去处理这种关系？在这个问题上，罗素的

[1] 此文见唐著《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上），1975年，台湾学生书局。

[2]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上），页387。

[3]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自序”，页4，1968年，香港新亚研究所。

[4] 唐君毅：《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页349，1943年，正中书局。